

河北谷子地 奔波13年让最后一位烈士回家

◆ 王成

李红旗今年39岁，他是河北省定兴县国兴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村里老辈人眼里，这李红旗从小到大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然而5张已经发黄的烈士证书却把他与一场发生在60年前的那场战争联系到了一起。



一次偶遇 用娶媳妇的钱买回烈属证

2011年8月6日，李红旗再次来到了父亲的墓前，看望已经去世4年的父亲。“爸，那4个烈属证已经找到家属了，现在只剩下广东杨会县这个有点不好找。我不管花多大的努力，怎么也得送他回家，您就放心吧！”说着，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

今年39岁的李红旗是河北省定兴县固城镇国兴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和村里大多数同辈人一样，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下地干活，16岁外出打工，然后盖房结婚、生孩子。1997年8月间的一天，李红旗和未婚妻徐艳华一起到保定城游玩，并打算顺道买点结婚用品。但平素就爱在古玩市场淘货赚点外快的他在保定古玩市场上意外看到了5张烈士证明书、一份唁电，还有一本油印的《全军第二次作战会议录》。落款显示这5张烈属证均系志愿军某部于1951年7月签发。上面有机密两个字，盖着小红戳，还有当时军长、政委、副军长、主任的签名。

未婚妻当时觉得死人的东西有点犯忌讳，咱是来购买结婚物品的干嘛看那个去？李红旗也怀疑这些东西是假的。李红旗说是假的，但摊主2500元的要价，却让他按捺不住想探个究竟，因为他知道一封解放前军人的家书，在市场上都值2500元。

李红旗对邮票特别懂行，他把烈士证拿到手一看，一眼眼睛就亮了！连初中都没有念的李红旗首先感觉到的是经济上的分量，“绝对能挣钱！”于是他咬咬牙花了2500元将5张烈士家属证明书买了下来。

刚买回来时，李红旗没敢告诉父亲，因为“是用娶媳妇的钱买的”。他把烈士证锁在柜子里，偶尔拿出来看看，但不久还是被父亲发现了。面对儿子高价淘来的5张抗美援朝烈属证，李红旗的父亲开始“研究”起来——

陈玉山，河北涿州市二区铁佛堂村人，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线”的战斗中牺牲，34岁，家属陈玉清。吕奎才，河北省北京市人，1950年12月1日在第三次战役中牺牲，22岁，家属吕邦俊。李金树，河北省天津市满楼区张窝管村人，1951年2月9日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4岁，家属李同玉。陈武昌，广东省阳会县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战斗中牺牲，23岁，家属陈王氏。周明星，四川省中江县五燕区狮子村人，1951年2月在杨子山战斗中牺牲，25岁，家属周明发。

1951年颁发的证书，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送到家属手里？是地址不详，还是地址有误？

老爷子盘腿坐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对着光线看了很久，冒出一句：“这些物件属于那些烈属，不能据为己有，更不能用来赚钱，咱应该还给人家。”“还？这是我花钱买的，还指着这个挣钱呢。”李红旗把这几张陈旧的纸片当作宝贝，小心锁进自己的柜子里。

“快50年了，地址都变了，不可能的事啊。”李红旗没有把父亲一遍一遍的催问放在心上。“后来我外出打工，每次回家都看见父亲站在村口张望。我突然想到‘烈属证’里的人，将心比心，他们牺牲时也就20多岁，音信全无，他们的家人这么多年该怎么过啊？”

李红旗一下子懂得了父亲的心思，“怎么着也得想法子让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回家。”他的第一个目标，锁定了河北境内的陈玉山。从1998年开始，他出门打工、跑运输，见人就打听。一个人的送烈士还乡之旅，从此开始。

谷子地是电影《集结号》中的男主角。战场上，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强敌，谷子地指挥战士硬是坚持抗击敌人。战争结束后，由于部队改了番号，谷子地找不到组织，九连牺牲的烈士们也被认定为失踪。死里逃生的谷子地抱着撤退的集结号究竟有没有吹响的疑问，开始了艰难的寻找。属牛的李红旗在某一点上，和浑身透着一股牛劲的谷子地还真有几分相像。北上香河、天津、北京，南下四川，通过证书中仅有的信息，查阅各时期的老地图，请教私塾老师，又向各地民政等相关部门求助。收入微薄的他除了得到过1000元的捐助外，先后自费3万多元，成功将其中的4张烈属证亲手送到烈士亲属手中。

因为证上的错误和历史的变迁，李红旗在寻访中面对的最大难题，是考证烈属证上的人名和地名。烈属证上的地址是河北省涿州市铁佛堂村。想在河北就近找起的李红旗打了河北民政局和地名办公室的电话才发现河北根本没有涿州市。“他们该不是搪塞我吧。”他想了想，问对方要了个传真号，把烈属证复印件发过去。他直思，人家看到烈属证复印件，就该相信他说的不是谎话，应该会认真帮他找。电话打了很多次，以至于对方一听见李红旗的声音就立刻挂断电话。

2003年，北京的亲戚建议他去军事博物馆打听。军事博物馆的专家也猜不出答案。直到2007年7月，一位在北京做生意的朋友告诉他，在河北香河县有个铁佛堂村。结果让“比结婚还高兴”的李红旗跳了起来。

李红旗立马拨通了铁佛堂村唯一登记在册的一家小学电话。但电话那头把这个陌生人当成了骗子。受挫的李红旗用起了笨办法，每天工作之余，就把香河县的电话号码的后3位变换组合，不停拨打。终于在2007年7月，接通了铁佛堂村一个厂里的电话。“我说我把烈士证复印件传真给你看看，我真没骗人。”对方接收了这个传真，就没了下文。几天后，正在地里干活的李红旗接到了电话。对方说：“我就是陈玉清。”李红旗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

烈属证能卖多少钱早已不再提起。李红旗决定亲自去铁佛堂村把烈属证交给陈玉清老人。老人告诉他，哥哥陈玉山十几岁就和老父亲赌气离家，再无音讯。老父亲临终时还念叨这是个“逆子”。

困难重重 认准的事就要坚持下去



▲ 李红旗安慰找到的烈士家属

▼ 李红旗与妻子徐艳华



在香河，陈玉清把烈属证放在父母坟边号啕大哭：“爹啊，我哥不是逆子，他是个烈士，是抗美援朝的烈士，是国家的英雄！”

李红旗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烈属证在我这里只是收藏品，但是在他们亲人那里，每一张纸的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决定继续寻找另外4位烈士家属。

从找到陈玉清开始，媒体关注到了李红旗为烈士千里寻亲的感人事迹。有了媒体的宣传和介入，事情容易了很多。2008年李红旗先后找到了北京烈士吕奎才和天津烈士李金树的家人，2009年他找到了重庆烈士周明星的家人。

妻子徐艳华这样评价自己有丈夫：“他这个人就是很固执，只要是他觉得对的事情，就会坚持做到底。”

在寻找烈士家人的过程中，李红旗学会了上网。在检索到的一些文章里，读书不多的李红旗悟到了这样的道理，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繁琐的考证并非只为厘清真相，这群从中国乡村走出去的“最可爱的人”，他们一个个鲜活地生过、笑过、忍苦、战斗，最后为国捐躯，他们的名字不该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永生沉默成为无名烈士。



► 烈士家属证明书

◀ 将烈属证亲手送到烈士亲属手中

特殊旅程 让硝烟再次走进人们视野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晚，志愿军首批部队秘密入朝，其中便包括5烈士所在部队。陈玉山、吕奎才、李金树、陈武昌和周明星，就是在夜色掩护下悄然跨过了鸭绿江。

作为王牌军，5烈士所在部队在朝鲜战场历经多次苦战，当时，他们以一个师的兵力，长途奔袭直插美九军后方，占据两个战略要地，堵死其南撤路线。志愿军4个军乘势从正面猛攻，美军被迫全线撤退，同时调集美骑一师和英第29旅北上接应，负责阻击的5烈士所在部队陷入敌军夹击之中。

危急关头，这支钢铁之师顶住每日上百架次飞机的轮番轰炸，一次又一次击退坦克兵、炮兵和步兵的协同攻击，使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足1公里却始终不能会合，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战例深深感动了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他在祝捷电报中被例为一支部队使用了“万岁”这一至高无上的赞美词，5烈士生前所在部队也因此被称作“万岁军”。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字。当月，5烈士所在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回国。5名烈士的遗骨未能回归故里，和他们一样埋忠骨于他乡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志愿军官兵，其中包括毛泽东之子毛岸英。

在找到第一个烈士家属后，有人找上门来，愿以每张2000元的高价，购买他手上剩余的4张烈属证。李红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13年来，李红旗自己也不清楚到底跑了多少路，打了多少电话。李红旗的举动，家人起初也不理解，村里人更是颇多非议，但10多年坚持下来，家人对李红旗的态度已由无可奈何变成默默支持。

如今，李红旗尽管因为替烈士寻亲声名远播，但朴实的他仍然本本分分地生活着。村里人都知道，李红旗很孝顺，父亲病重期间，为照顾父亲曾经3天没有合眼。结婚10多年来，李红旗与妻子相濡以沫，共同分担家务，以身作则教育子女，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丈夫、好父亲。

李红旗手里最后的一张烈士证上的烈士叫陈武昌，上面地址是“广东省阳会县”，联系人“陈王氏”。可据调查广东境内并没有一个叫“阳会县”的地方，寻找起来难度非常大。目前，李红旗将寻找目标放在了广东省惠阳市，原因是他在那个姓李广东人那里得到消息，当时的惠阳所辖的县包含“阳春”、“阳东”、“阳西”等“阳”字地区，这跟烈士证书上所标的“阳会”县可能会有联系，在得到其他可靠消息之前，这条信息是李红旗得知的唯一线索。“再困难我也要去做，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是我最大的心愿。”李红旗的态度十分坚决。

13年过去，李红旗人生中的这次特殊的旅程还剩下最后一站。李红旗始终在打探着，希望赶快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可有时候他心里面也会有点隐隐的不舍，不希望那么快结束，因为他所找到的这些人和那场看起来和他毫无干系的战争，其实无意间早已成了他过去10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李红旗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但他还是等待着最后一名烈士的消息。